

02

2000. 2

(总第八十六辑)



要

- 我的自传
- 范权献身儿科医疗事业的一生

目

- 鲜灵霞小传
- 吴咸中院士传略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0·2(总第86辑)

岁月回眸

- 我的自传 伧铁隼(1)
雪域高原回忆 薛德亮(15)
忆“三反”、“五反”追缴赃物赃款 王悦珍(28)

时代足迹

- 范权献身儿科医疗事业的一生 杜天经(36)
防疫灭病 情系灾区
——1964年天津医疗队在新河 陈 革(56)
艰难探索中西医结合之路 吴宗璘(75)

金融史话

- 独立自主谱新篇
——忆天津解放初期外汇工作 茅庆霖(86)
建设银行初创时期的几个片断 李家祺(91)
建国初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扶植
出口创汇工作的回顾 沈廷梁(94)

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诞生	宜益 涓(98)
天津解放初期的外汇交易所	李树声(103)
天津第一家城市信用社的建立	彭 博(107)

艺海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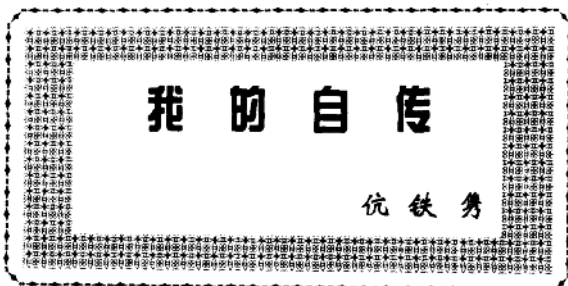
鲜灵霞小传	戴春霞(113)
宁死舞台 不歇一日	
——河北梆子艺术家王伯华小传	甄光俊(124)
大胆改革的时调表演艺术家王毓宝	袁树兴(138)
忆父亲何迟二三事	何红淬(141)
琐谈天津装帧五十年	刘丰杰 冯为慈(145)
无愧无悔后半生——记老报人孙立民	石 坚(152)

政协之星

吴咸中院士传略	纪晓泉 米镇波(154)
---------------	--------------

海外追踪

古巴化工血泪史(一八四七——一八九五)	高宗鲁(173)
封面照片说明	(74)



我1913年农历12月12日出生。先父仇乃茹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朋友。先父不仅是优秀的化学教员，而且多才多艺。周总理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曾多次和先父同台联演，师生感情颇深。我的生母邢鍾秀是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勤俭持家，她共生育七个子女（五男二女），后因风湿性心脏病去世，年仅48岁。先父后续弦南开校友会阎子恒的妹妹阎如玉女士，共生二个子女（一男一女）。我为仇家的长子，其后是：铁健、铁侠、铁杰、铁伟、铁宝、铁信、铁佩、铁仪。我的夫人顾钧，解放前做过重庆回民医院的护士主任、南开大学的校医，解放后一直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我有一子仇大器，1945年出生在重庆。现在我已四世同堂。

童年时代我的家境尚可，但国家内忧外患。那时父亲在南开中学做教员，我家就住在离校较近的南开女中和南开中学之间的同仁里3号，4号住着孟新祥先生。这房子是张伯苓校长用了自己大半生积蓄，为南开的优秀教师建造的。这里的环境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不错的。张校长始终坚信富国强民就必须把教育搞上去，搞好教育的关键是要有一支好的师资队伍，因而他倾其全力网罗优

秀人才。记得我家的小院里有两颗芙蓉树。每到花开季节，微风袭来，阵阵飘香，仇家的孩子们都在这里玩。母亲慈祥可爱，是我们的守护神。父亲严肃，孩子们有些怕他。有客人来访，不要说孩子们，就连母亲也要回避。父亲常在客厅或书房里接待客人，说话声音很小，孩子们既不知来的都是什么人，也有知干什么来了。1920年父亲把我送到文昌宫小学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再有客人来访时，父亲便让我去开门，后来我才知道经常到我家来的客人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在南开中学念书，他学业优良，思想进步，极具爱国心，积极投身到救国救民的社会实践中去。当时的南开中学在张伯苓先生的领导下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学校。学校对学业优秀的贫困学生免交学杂费，所以许多人才云集本校。张校长不仅要求学生学业有成，而且也号召学生热爱国家、关心民众。校内演出了许多进步戏剧，当时叫新式话剧或文明戏。周恩来因长得秀气经常串演话剧中的女角色，先父也经常和学生同台演出，因此和周恩来等一些进步学生接触较多。周恩来的思想对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对他很赏识。他也成了我家的常客。他每次来都化了妆，有时是光头，有时又是大胡子，以免被特务发现，牵连我家人。记得有一次周恩来到我家不久，就又有人敲门，父亲一听不对，（因为每次周恩来来敲门有暗号）先父就对来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家没钱”。然后把门关上。这时来人随即放了一枪，我们全家都非常紧张，先父一看就给警察局报了警，警察来了后那人又放了一枪就溜了。先父说那个人是冲着周恩来来的。总之，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先父做了许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但他从不炫耀。

1926年我考入南开中学，和刘绍武、朱宗尧同在一个班。周恩来来我家的次数就更多了，他来时先父叫我开门，谈话后父亲送他走，但每次都很久才回来。这样的情况我当时也记不清是多少次了。我虽然不知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父亲的脸部表情看，觉得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每在这时候母亲倒是说：“小周又来了，你父亲

又要给他钱了”。

1932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我父亲都非常高兴，张校长说：“南开的子弟还是不错的”。在南大读书时我非常刻苦努力，二年级的定量分析实验，寒假后的一个月我就完成了。讲授本课的系主任张克忠教授邀请我利用定量分析课的时间和一些课外时间，在南大应用化学研究所做些外界委托的分析任务。我一边学习一边勤奋工作，在张克忠教授的指导下，采用高压蒸煮高粱的方法，提高了制造酒精的效率，使其超过了国外水平。并发表了《高粱酒之固体酿造》的论文，深得张克忠教授的赏识。

1936年南大毕业后，应用化学研究所留下我参加研究工作。在研究所工作中我对锰的分析方法和煤的发热量的计算公式进行了改进，写出了《水分析法》、《煤的分析》、《油的分析》、《气体的分析》四本书，协助我的是同事李保正。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最爱听林红玉的大鼓书，我们几个人（钟秉志、卢焕章、于其兴等）经常在天晴茶馆包厢，每人花一块钱，听林红玉演唱。这在当时算是一种高享受了。在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一方面担任南大化学系助教，一方面从事应用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记得有一天警察局在女学生宿舍拿来一瓶溶液不知是什么，张教授让我去化验，我打开后经化验是瓶浓硫酸。此后我就成了警察局聘的顾问，并一直延续多年。我在化学所工作了两年多，这时期正是日本加紧侵华步骤国内局势动荡时期，为保住南开大学，校方研究准备将学校搬到后方去。我记忆犹新的是图书馆的搬迁。我和几个骨干按照校方的部署，整理装运图书。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极其困难，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校方交给我们的任务。为保护学校藏书不受任何损失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非常欣慰的。

1937年8月我是最后一批离津到达重庆的。到重庆后不久，我高烧不退，住在回民医院并和顾钧相识、相爱、结婚。结婚前，有

一天顾钧在我家，周恩来也来了，那天正好包饺子，顾钧调馅时错把醋当成了酱油，周恩来吃的时候尝出来了，问是怎么回事？大家这才恍然大悟，都笑起来，周恩来也笑了。后来我们结婚时，张伯苓先生为证婚人，周恩来也来参加婚礼，并在纪念小旗上签名留念。婚礼上大家欢声笑语，周恩来即席发言，他说：“希望顾钧做饭时注意调料”。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

记得重庆沙坪坝有个沙瓷书店，是地下党联络站，还有一些进步书籍。为了对付当局的突然搜查，书店的书架是可以转动的。当有人来查时，书架就转成普通书籍。我当时给周恩来送信，经常去曾家岩，他的司机老段同志告诉我曾家岩附近算卦的、卖鼠药的都是特务，所以每次送信后不敢多呆。在曾家岩，周恩来和董必武住在一起，有一次我还看到董必武同志抽着旱烟袋往鞋上磕灰。有一次我去曾家岩送信，周恩来不在，我就又去了沙瓷书店，书店也关门了，后来才知道，书店的一个售书员叛变了。从沙坪坝到沙瓷书店，到曾家岩，到红岩嘴是我常走的地方，那时都是山路，也没有交通工具，完全靠步行。这些往事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重庆南开大学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可回忆的人和事太多了。记得沙坪坝有个金城银行，银行的老板姓王，大家都叫他王经理，当时看上去年纪较大了，人也很胖，父亲告诉我，王老板保护了很多共产党人，是个对革命有功的人。周恩来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扩大统一战线工作。沙坪坝有一个永利碱厂，经理范旭东颇有影响，还有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先生及傅作义将军和夫人等，周恩来都一一会见过他们，争取他们对革命的支持。听我父亲说：“总理在重庆时曾患小肠疝气，住院手术，手术大夫名叫王厉庚（解放后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当时蒋介石去看望生病的于佑任先生，顺便去看周恩来，他劝周恩来病好后到峨眉山去休养，周恩来笑着说：“你不知道吗？到峨眉山要过清目关，你那里有个卡子我是过不去的”。蒋讨个没趣后走了。在重庆周恩来还请我们一家

看过秦怡主演的《雷雨》。

在西南联大(南开大学)工作了一年后,我又到了标准药厂作工程师。药厂经理王药雨是个开明人士,曾积极支持八路军抗日,捐献了许多药品。标准药厂在重庆远郊的向家坡。虽然在大后方,在战争中没有逃过厄运。记得日本飞机曾经三次轰炸标准药厂,使药厂元气大伤。有一天晚上邓颖超来到我家,告诉我说:“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捕,我这里有个小瓷盒和书信交给你们,希望能给我保存,盒内有恩来同志荣获的勋章和一块手表”。说完赶快走了。那时的重庆警笛长鸣,只要一有空袭就发出长鸣报警,同时在最高处挂着灯笼,挂一只灯笼时,代表飞机离得较远,但还有警报声,挂两只灯笼时告诉人们飞机已临近现场。解除警报时也响笛,但灯笼就没有了。由于受邓大姐之托,我的夫人顾韵只要听到警报一响,就拿着书信和小瓷盒跑到防空洞去。这样不知有多少次,信件和小盒总算安然无恙保存下来。解放后邓大姐把小盒内的东西取走时对我们说:“这个兰花的小瓷盒是总理去日本留学时买回来的,留下做个纪念吧”。这个小盒在我家几十年,“文革”期间抄家时,也被抄走了,后来落实政策时,陈德和给我拿回来了。天津周邓纪念馆建馆后,馆内工作人员和我联系,我才依依不舍地捐献给了纪念馆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了起来。

在重庆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是牙医韩文信大夫。抗战期间他住在南渝中学,在美丰大楼上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医术精湛,身强体壮,但脾气古怪,也是天津人。他告诉我,他打过孔祥熙的秘书一个耳光,因为孔家二小姐要看牙,和韩大夫预约后又不看了。当时财政部打了一个电话到诊所说:“你是韩文信吗?告诉你,二小姐不着牙了。”韩听后放下电话,就到了财政部问:“是谁打的电话?”一个人(孔祥熙的秘书)走过来说:“是我打的。”韩上去给了这人一记耳光,然后说:“我韩文信是随便叫的。”然后扬长而去。在重庆时我有一阵子牙经常痛,于是就到韩大夫处看牙,韩说:“你的

牙该拔了。”于是打上了麻药，前后大约用了五分钟就把牙拔了，拔完牙他让我等五分钟后，就请我吃烧饼夹牛肉，喝咖啡，我当时真有点不敢吃。他说：“你吃吧，没关系”。结果还真像他说的那样，一点事也没有。后来我又拔了一颗牙，还是照样。但韩大夫给我治病说什么也不收钱。过了一阵子我又闹牙痛，因韩大夫不收钱，我就不好意思再到他的诊所去了。于是，我就到沙瓷医院去看牙医，大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拔好，我的嘴都肿了，当时疼得我一天没吃饭，没办法我又去找韩大夫，韩大夫风趣地说：“你是不是看上医院的那位小姐了，告诉你吧！她没给你拔净，还有牙根在里面呢！你痛不痛吧？”这次我反倒给他找了麻烦。他用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才把牙根弄了出来。他说：“这次得多等一会儿。”20分钟后又吃的烧饼夹牛肉，喝咖啡。在重庆时周恩来有牙病也是找韩大夫。韩大夫的儿子韩忠琪爱唱京剧，经常练嗓子，吵得张伯苓先生受不了，就和韩大夫说了，韩大夫一气之下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后来，韩忠琪跟着父亲学医了。解放后听说韩文信大夫回到上海，继续做他的牙医。有一次毛主席患了牙病，总理建议韩文信给主席看牙，韩给主席医好了牙病。

当时学校有个校医叫王慈吾，因不满国民党统治，要求到解放区去，经父亲推荐到八路军办事处，听说王去了延安。在这之后顾钧曾做了一段校医工作。因战时的重庆比较混乱，先父曾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想让我出国留学，周恩来回信说：“我和苏联、德国联系比较多一些，就到苏联或德国去吧。”正在准备办手续时，二战爆发了，留学只好作罢。

40年代中期我考取了美国留学，张伯苓校长高兴地说：“不错，是我们南开的子弟”。在美国留学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对美国的工业溶剂和工业酒精、啤酒行业进行了考察。我曾在美国肯塔基州一个高级酒精酿造厂做过研究工作。那里酿造酒精是用玉米和高粱作原料的，先加热成糊状再做

酒。我参观考察后提出建议,让他们采取高压的办法蒸煮高粱、玉米。记得他们负责人叫克洛晓夫(波兰人),是个博士,听了后点头赞成。实验后果然很好,所有的高粱、玉米完全转化并且还省时。克洛晓夫给了我一个名誉工程师称号,并向我颁发了奖状。回国后,我写了一篇此项研究的英文论文发表在《中国化工》杂志上。在美国伊利诺州一个啤酒厂,考察发现,他们用的原料还可以,啤酒花是捷克的。我在这个厂给他们提了不少建议,这个厂也给了我一个名誉工程师的称号。在美国期间我参观了美国的摩天大楼,还有幸见到了中国碱业专家侯德榜先生。我们上楼时乘电梯,下来时电梯不能下了,一打听才知道是工人罢工,30几层只好走下来。从这也可以了解当时美国的工人运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我即启程回国。此时我夫人顾钧和陈学荣女士在重庆把一些没用的东西卖掉,把周恩来的信件、小瓷盒、小旗子带在身边,抱着儿子坐船回天津,顺便路过上海接我。我正好乘飞机从美国回到上海。到上海顾钧在卢焕章家暂住一夜。(卢是应用化学所的一位研究员),第二天我们买上船票,回到天津。回到天津,我们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先住在南开校友余新民的父亲家里。当时因余父家住的并不宽裕,我们三口只好睡在地上。费了很多神,后来找到了大理道的房子,才算安顿下来。我又回到南开大学化学系教书。

从1946年到1952年,我从讲师升到副教授、教授。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刻苦钻研、孜孜不倦,为科研转化为生产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和基础性工作。在张克忠教授的领导下,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系研究所办得精干、讲求实效。它既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又注重实践活动;既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又为社会的需要服务。当时的应用化学研究所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工作。如为永明油漆厂研究了红、白、黄铅粉,解决了他们企业多年来未解决的难题。为范承和化妆品厂研制出用牛油做的硬脂酸、甘油、杀虫水。为仁立毛纺厂研究出它们需要的软质钾皂等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1951年9月天津市工业试验所成立。这是我市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科研机构,张克忠教授是第一任所长,我被聘为该所的顾问工程师,1952年我担任了该所的化工研究室主任,后来我担任副所长,1961年又被李耕涛副市长任命为所长。以后工业试验所改名为天津市半导体技术研究所,直到现在我仍为名誉所长。

我为研究所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这也是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建所初期,我应张克忠教授的邀请,为新进所的练习生们讲授定性、定量分析化学、工业分析(主要包括煤、水、油和气体的分析)和英语。我在主持化工研究室期间,该室的技术咨询、分析实验和工业问题三个组经常忙得不可开交,分析化验任务较大,难题较多,涉及面较广。我经常带着技术骨干走进企业大门,送技术为生产服务。我们到印染厂在生产车间里搞实验,帮助企业改进生产工艺,解决了阴丹士林“续染法”,成功地解决了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既为国家节约了外汇,又为我国印染工艺填补了一项空白。又如,为解决火柴头的滋火问题,我们深入到车间,发现问题的症结,及时给该厂提供了火柴头的科学配方,提高了产品质量,同时也保障了安全生产。又如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室接受了对一些私营工厂生产的军用胶鞋和雨衣含胶量的检验任务,查出了一些不合格产品,对保证军用产品的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解决各方面的难题。从那时起我就担任了天津市公安局的消防处和危险品管理委员会顾问。曾多次参加过市里重大火灾及危险品意外事故的现场调查和化验工作,其中有1952年北站氯气漏气事故,1954年的同泰公货场硝化棉爆炸起火事故,天津近代化工厂硝化棉爆炸伤人事故分析,北郊曙光化学生产合作社低沸点溶剂起火事故,1959年蓟县一工厂炸药爆炸事故,天津南货场车站硫磺起火以及天津市体育馆大火等多起重大火灾事故的分析。每次事故发生后我都和技术人员,有关专家赶到现场,调查研究,分析事故原因,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我还协助公安局的同志一起制定了《危险品管理

条例》和《危险品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意外事故的起因、教训还写出了《有关危险品管理工作的一些体会》。并且协助市公安局消防处阅校了《物理与自然》、《地震消防问答》、《可燃气体专论》等书籍和《危险品管理手册》、《可燃气体的防爆和安全运输》等小册子。

1957 年我随中国经济代表团去美国、比利时和奥地利考察。随团去了许多专家,团长是纪朝鼎。在参观考察活动中我了解了西欧半导体材料的研究和生产情况,我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对于锗及其它半导体材料的生产保密很严。回国后我一方面撰写一篇题为《英国化学工业概况》的考察报告,一方面着手收集有关锗的资料。根据当时国家国防工业的需要,1958 年开始主持半导体材料锗的研究工作。同年国家科委在长春召开了有关单位参加的研制锗的工作会议。会后天津市成立了 601 办公室专门负责锗的研制工作。当时我市各有关工厂主要是开展从烟道灰中提取锗的研究工作,我所的周玉香参加了烟道灰提取的普及工作。我所负责提取超纯锗的工作,由于从烟道灰中提取成本高,一些工厂相继下马,我们所坚持了下来。此后 601 办公室又与发电一厂联系,把该厂原有的一个提锗车间让给我所作为实验厂。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从某地的 96.94 吨煤中提取了 946.44 克的金属锗。这一实验成功后,我们还必须对锗的工艺全过程进行研究整理,以便为批量生产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和规范的工艺操作规程。为解决这一课题我在对如何防止四氯化锗的挥发、四氯化锗如何提纯、在二氧化锗的还原中如何防止爆炸、氢气如何提纯、尾气如何排除等一系列工艺技术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我还和所里的技术人员共同对外地的四氯化锗和粗二氧化锗及锗半成品进行加工。这项研究工作持续 8 年,先后共研究了 13 个课题,使锗的纯度达到七个“9”或八个“9”的水平。到 1962 年粗锗的产量达到 100 公斤, 占当时全国锗产量的 1/5 左右,创造价值约 100 万元,在 1964 年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上获得了国家计委、经委、科委三个部委授予的一等奖。这在科

研领域里也是不多见的。当时的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在一次市人代会上说“锗的成功，贵在坚持”。这是对我所关于锗的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在锗的研制过程中我特别要感谢所里的几位功臣，他们是：傅雄祥、曾爱东、陈志德、张大勇、陈仲方、游乃器、吴仲安、陈德和、吴塞文、孙黎明、周玉香等。在锗的科研工作中我们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尖子。我同时还组织所里的工程技术人员查阅美国化学文摘，把 50 年间（从 1911 年—1960 年）的有关锗的提纯、冶炼、基本性能等文章并全部译出，将其分为十个部分，共出版了三卷本的《锗的化学文摘》。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在该书的序言中写到“这是一本极具价值的专题系列文摘”。这一年半导体材料实验厂投产，锗的研究工作才告一段落。

锗研制移交到实验厂之后我又主持了半导体硅材料的研究。根据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上级的安排，我市硅材料项目要从小试到中试，投产后再移交企业。我当时被聘为 703 厂顾问，主持并亲自参与了许多项目的研究工作。我查阅了上百万字的有关硅的研究国外资料，对研制工作起到了有利的推动作用。从机构设置上我们也加大了工作力度，成立了硅材料研究室，开展单晶硅及硅外延片的研制。1968 年试制后，产品当年被上海元件五厂采用，使该厂生产的管芯合格率提高了一倍。上海元件五厂是我国第一只晶体管的诞生地，由于我所外延片在该厂产品试制中效果显著，所以迅速在全国扩大了影响，先后有 15 个省市的 40 多家企业采用我所的产品。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0 年至 1976 年曾供应全国各地 200 多万片，使科研转化为生产实际，为我国电子工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科院半导体材料专家林兰英曾专程来津考察我所四氯化硅精馏的工艺设备，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75 年我们还接受了电子工业部委托，组织相关单位，以我所为基础，制定了“硅外延片及其检测方法”的部颁标准，为规范行业产品质量，促进半导体材料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这个标准一直沿用至

今。在硅材料的研制中，我们先后六次获电子工业部和市政府的奖励，之后我们又开展了半导体材料砷化镓的研究工作。我们从砷化镓的提纯入手，合成制备了砷化镓的水平单晶和立拉单晶，第一颗立拉单晶是许锡青搞出来的。当时的市长胡昭衡对这个项目非常关心，并亲自观看立拉单晶过程。在试剂过程中为解决“粘舟”问题，我和年青人一起倒三班加紧工作，由于视力不好，为观察单晶的生长情况，每次去掉有色防护镜才能看清楚，每次都得忍受着长时间对眼睛的辐射。经过多次研究，摸索出一套完整的工艺技术，也积累了一套宝贵的技术资料。1974年我所支持营口火柴厂建立砷化镓半导体材料车间，不仅为该厂代培技术骨干，还协助他们调试设备，使该厂砷化镓单晶材料较快地实现了小批量生产，并成功地推向市场。以后我所还研制了许多新产品。如：为彩电配套的平面管，为640配套的中功率等，还开展过集成电路磷砷镓发光材料等项研究工作及蓝宝石的研制工作。在科研工作中，我所自始至终都受到了市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李华生、李中垣副市长，市委工业部601办公室主任郭景贤、科委主任罗云等领导对我所搞硅材料、砷化镓及后来的蓝宝石单晶等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有力的支持，这也是我所取得重大成绩的根本保证。

1966年“文革”以后，工业试验所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原隶属市科委，后改为二机局，后又与无线电元件七厂合并成立市半导体技术研究所和第四半导体器件厂，几经变易后成为独立的市半导体技术研究所（简称半导体所）。1972年上级恢复了我的领导职务，我下力量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重建理化分析研究室。破坏容易，重建难，“文革”前一支好端端的分析队伍散了，许多仪器相继丢失，损失大呀！我非常痛心，但还得干哪！一切从头开始，首先解决没有实验室的问题。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及时完成了旧实验室接三层的基建工作，使所内面积增加了600平方米，全部用于理化分析。经过二三年努力，购置了设备，调入了技术人员，使理化

分析实验室初具规模,为本所科研工作面向社会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我又利用各种机会,争取把理化分析中心建在我所。1979年市政府投资65万元建成4900平方米理化分析中心楼,1986年竣工交付使用。现在的理化中心能承接各项理化分析工作,服务质量享誉社会,为天津市和外省市的经济工作做出了贡献。在主持研究所期间,我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记得在四机部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我作为特邀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报告中多次被掌声打断。第二天会议未结束,我又被中科院北京半导体所请去作报告。同年11月中科院在上海召开学术会,我和林兰英、黄昆、邹元栖等五人作为特邀代表在大会上作报告。1979年中国电子学会在福州开会,我作为测试学科主席和大会执行主席参加大会并作报告。1982年我70岁退居二线担任名誉职务,在离开所时,我种下了一棵树,并在树上挂了一个小牌上面写着“但愿树长青”,以表达我对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事业的依恋之情。

1957年由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当时的市委统战部孟秋江部长请我参加民主党派,我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多年来在党派中我注意学习,改造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我曾任天津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三、四、五届市政协常委,六、七、八届市政协副主席。同时还担任农工市委秘书长、副主委、主委、名誉主委。1980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并参加了市四、五、六届党代会。1991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授予我政府特殊津贴。在党派工作的几十年中,我作为十名兼职领导干部,工作无论多忙多累,只要能安排开,我都积极主动参加党派的各项工作和活动。我积极依靠党委,围绕中心任务,深入细致抓思想,积极主动做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把一批有影响、有代表性的高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如:蔡陆霞、郑静候、王锴、刘绍武、王士根、边天羽、郭仑等等。在范权担任农工市委主委期间,我支持主委的工

作,尊重他的意见,互相理解、互相配合,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党派工作及活动蓬勃发展。我们不仅依靠老同志,还大胆起用和培养年青人,如张大宁、王若涛就是其中的典型。

范权辞去主委职务后,我受党委和党员的委托被推选为主委,更觉担子重,责任大。我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我担任政协副主席时分管学委会工作,这对我抓党员干部学习又多了一个有利条件。每逢学委会有大型的报告会,我都亲自主持会并号召农工民主党干部参加学习。我还注意抓履行职能的工作,党派作为参政党就要搞好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工作,在参加市委、市政府的协商会上,我经常代表党派建言献策,勇于直言,从全市的大政方针到干部的福利,我都一一记在心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积极做海外统战工作,吸收国外资金,为天津市经济工作服务。市政协党组对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协助,其中最典型的是天津国际大厦的招商引资工作。当年美籍华人涂必懋先生为我市做了大量引进资金的工作。涂先生原住在上海,后来随父母来到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1937年曾入选中国童子军,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大露营活动,由于日军侵华战争,涂不能回津就辗转去了重庆,继续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在重庆期间,其父涂伊增,经常写信托我照顾涂必懋。涂必懋后来一直生活在美国,1976年才返津探亲,见到离别30年的父亲。从那以后,他每年都要回来一次,并且非常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十多年间他回国洽谈贸易百余次,多年来总投资额和利用外资额超过二亿美元。后来他的女儿婷娜回国来也总是来看我。

在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我曾和周叔弢一同去过沧州慰问,并把稿费献给沧州灾区;我还和赵今声一起去参观考察。在和陈冰、廖如辉、朱先章、罗彦、沙小泉等接触中我们感情极为融洽。市委统战部孟秋江、黎钦等老部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是我的领导而且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这些年我对科研和统战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文化生活也比较充实。我最大的爱好一是集邮，二是听京戏。后来我的眼睛不好了，只好把他们交给子孙来做。现在我已年近 90 岁，每天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听听广播和京戏；一日三餐，素食为主；多年吸烟的习惯也戒了。除了眼睛患有白内障外，身体尚可。每到年、节，市里的领导都来看望我，我很感谢。

古语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年近九旬，是托党的福，我一直有个愿望：

但愿天津象奥地利那样经常举行马拉松比赛。

但愿天津的工人都像美国的技术工人那样生产出优质产品。

但愿天津象德国的富兰克林那样灯光明亮。

但愿天津象瑞士那样清洁卫生。



邓颖超与佘铁笏夫妇合影